

◀（上接 6 版）

1950 年代起,唐先生多次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卷入政治风波。1952 年,他因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思想保守”为被审查,一度辞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的职务。1958 年,他被视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权威”,在武大历史系受到多次批判。1966 年,“北朝四史”的点校工作被迫中止,他回到武大接受批判。唐刚卯回忆,1970 年代中叶武大“批唐(长孺)打吴(于廪)”,父亲还被从北京揪回武汉批斗。朱雷记得,1978 年 10 月,一位余姓教授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汉代研究代表团”团长与唐先生在故宫会面时,他陪同在旁,余先生问唐先生:“‘文革’中您受冲击了吗?”唐先生答:“照例的冲击不能免。”

在大多数人看来,唐先生能相对平安地度过特殊年代,主要是因为他为人谨慎。余先生在记录与唐先生的初次会面中写道:“谈话开始后,我很快便警觉到他是一位异常谨慎的

人。他只答复我提出的问题,而且必三思而后言,但从头到尾没有主动地问过我任何问题。”当时,余先生见唐先生的一个目的,是想试探他肯不肯与西方学者合作,参加《剑桥中国史》魏晋南北朝卷的写作,即由他择题用中文撰写一章,再请人译成英文。朱雷记得,唐先生当时竟对余先生说自己不懂英语。有趣的是,唐刚卯也是到改革开放后的某天,见到父亲与吴于廪先生讨论武汉大学学报的英文版摘要应如何翻译时,才知道父亲懂英语。

教学与研究

1929 年,唐先生进入大同大学文科学习。唐先生的弟子、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李文澜记得,唐先生曾说自己当年的课程有罗马法、商法、市政管理、比较刑法、西洋现代史,却没有中国史。唐先生在大学期间常去光华大学“蹭课”,由于旁听了不少吕思勉先生的课,开始自行攻读中国古代史学。

唐先生早年专注辽金元史,后来转向了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这个转变大约发生在上世纪 40 年代初。1941 年,唐先生在担任光华大学讲师之余,除了继续研究宋辽金元史,还将研究时段上延至先秦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李文澜记得,唐先生晚年回忆个人经历时曾说,“我不会民族文字,所以选教秦汉至唐这一段”。张忱石记得,唐先生曾说由于自己只懂英语,不懂俄语、蒙语、波斯语,所以转向了魏晋南北朝的研究。

1946 年,唐先生晋升为国立武汉大学教授。1955 年,他招收了首批副博士研究生高敏、陈国灿。张忱石说,这个举动在当时学术圈中是罕见的。上世纪五六年十代,很多教授由于担心自己在各类运动中“被揭发”遭批判,不愿意带研究生,即使带来也让学生毕业后尽量去外地工作,“但唐先生愿意带学生,而且还希望他们毕业后能留校”。

陈国灿说,唐先生虽是初次指导研究生,但要求相当严

格,寒暑假也不休息。唐先生规定他们第一 year 要埋头读书,首先得通读《资治通鉴》,至少熟读其中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还要读新旧《唐书》、《隋书》等。每周三下午,他们去唐先生家汇报学习情况。唐先生博闻强记,随时会提问,还要追问:“你这么说,有什么依据?”有时候当场答不上来,唐先生就要求他们回家思考,第二周再来汇报。

1959 年,唐先生招收了第二批研究生朱雷、卢开万。朱雷说,考上研究生后就是接连的劳动、运动,唐先生便让他们去家里上小课。后来,政治环境愈发恶劣,唐先生就给他们开了书单,要求他们自己学习。1961 年,唐先生招收了第三批研究生杨德炳、鲁才全。此后至“文革”结束,他没有招过研究生。

1966 至 1971 年,唐先生去襄阳下乡。1971 至 1974 年,他借调到北京在中华书局点校“北朝四史”。1975 年至 1986 年,他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在北京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1978 年,研究生恢复招生后,唐先生

招收了包括张弓、黄正建、李文澜、王素在内的 8 名硕士研究生。王素说,自带了研究生后,唐先生基本每年寒暑假才去北京整理吐鲁番文书。如果在北京忙不过来,他会提前给学生布置作业、开书单,并让其他老师检查学生的学习进度。

唐先生的多名弟子都提到,唐先生对他们治学的最大要求是“贯通”。虽然学生们主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但唐先生并不提倡他们在断代史里绕圈圈,而是重视历史时期的前后比较研究。改革开放后,他特别强调要关注国外的学术思想和动态。余先生曾说:“在 1978 年那场短短的谈话过程中,我得到一个清晰的印象,就是唐先生完全承认学术研究的全球性。”

李文澜记得,唐先生从一开始就教导研究生要学好日语,“主要是阅读能力,要了解日本学者的研究”。为此,唐先生请了毕业于奈良女子大学的日语老师给学生们开小灶,教授大家专业日语,并训练大家日译中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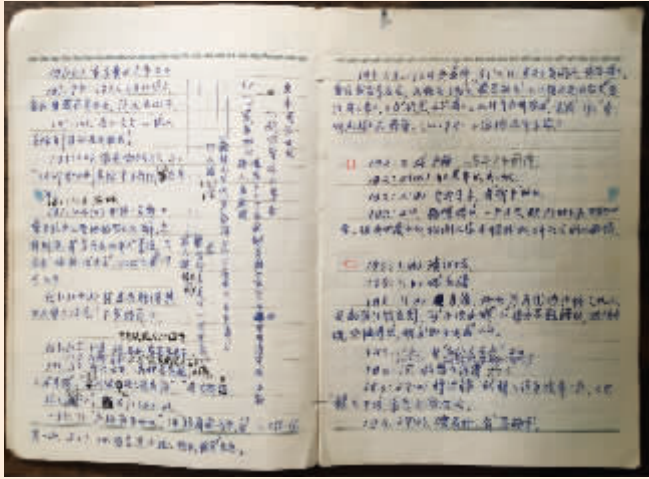
除了要求学生史料熟悉,唐先生还注重培养他们的框架性思维。黄正建介绍,唐先生自己选定的社会史和文化史文章,大多从小问题入手去研究社会和文化问题。从一首诗或一篇传,都能联想到学风或风俗。唐先生的弟子孙晓林说,唐先生最关注中古社会基础性问题,如土地上劳动者的身份这样的基本经济关系问题,还有典章制度方面的职官、军事兵制等等,创获尤多。学生们受其影响也多在这些领域中耕耘,少有人专门去做人物的个案研究。

张弓记得,刚入学时唐先生就对他们说,历史研究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唐先生在 1950 年通读了《资本论》,细致研究《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1951 年,他再次通读《资本论》,深入研究《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在唐先生给他们开的书单上,除了史学方面的必读书目,还有不少上述马列主义的书,“共 51 本书,要求我们在一年内读完”。

1955 年,唐先生所撰《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一书出版,同年 9 月陈寅恪先生去信称:“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张弓认为,当时陈寅恪自称“不宗奉马列主义”,主要是反感“穿靴戴帽”、“以论代史”的恶劣学风,而唐先生与“时贤”不同。

唐先生与吐鲁番文书的整理

本报首席记者 单颖文



1975 年,唐先生投身了一项功在千秋的事业——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谓吐鲁番出土文书,是指 1959 年到 1975 年,在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和哈拉合卓两地以及乌尔塘和交河古城发掘清理 450 余座晋到唐的墓葬时,发现的近 3000 件(含残片)汉文文书。1975 年,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武汉大学历史系组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由唐先生主持整理。

不料,项目开始之初就发生了悲剧:唐先生在新疆考察时,右眼突然失明了。关于失明原因,坊间有多种传言。据唐先生写给夫人的家信:“(1975 年 4 月)24 日游天池,于 27 日乘机赴库车。下机后发现我的右眼失明,据当地医生判断,大致可以断定是网膜脱离。……今天先在乌鲁木齐医院诊视一下,大概即在数日内飞京,由冶秋同志介绍进同仁医院诊视。”

但这一突发事件并没有影响整理工作的正常开展。从 1975 年起,朱雷、陈国灿等武大年轻学者先后随唐先生进京整理文书,参与了拆揭、拼缀、录文、标点、断代、定名每个环节。陈国灿记得,文书都是从新疆运到北京的,由于是出自千余年前古尸身上之物,在拆揭环节即困难重重。尤其是有大量没有拆开的纸鞋、纸靴,还有纸棺——纸都极薄易脆,拆揭一点都很费功夫。

朱雷说,拆揭后的工作是拼缀,拼缀后的工作是录文。因为有

近万片断裂开的小残片,如果不进行拼缀,复原成较为完整的文书,是很难进行录文的。但出于对文物的保护,最开始他们不能直接拼缀残片,而是要用那些摄印都不太清楚的小照片试做拼缀,甚至根据这些小照片做录文。当时唐先生也和 大家一样拿着小照片去做录文工作。那时他右眼已失明,左眼戴眼镜矫正也只有 0.2 度。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唐先生想了个妙招,即在照片背后用台灯照射,让文字从正面看起来清晰些,大家纷纷效仿。到了录文核对阶段要使用原件,考虑到文书上多有血污,且带有尸臭味,细菌甚多,大家都劝唐先生少接触,唐先生却说:“我不看原件,怎么知道对与不对?”坚持每道工序皆不免省。

完成拼缀和录文后,接着是对文书进行归类。陈国灿记得,一开始文书整理是按照文书性质,即官

文书和私文书进行分类,但唐先生认为,当时对很多文书的性质并不清楚,很难分类。他对唐先生说,当年法国人马伯乐整理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时按照性质分类整理,结果有很多文书要么无法归类,要么归类不准确,弊端甚多。与其这样,不如参考考古学,以墓葬为单位整理,这样既能以原始面貌客观呈现,又不会混乱、遗漏,还能 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依据。在第二天的讨论会上,唐先生让他提出这个建议,众人经过讨论后,统一了按墓归类整理文书的做法。

1981 年,刚刚硕士毕业的王素加入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王素说,在整理吐鲁番文书时,唐先生每件文书都要过目。由于目力日渐衰退,他就半躺在靠椅上,让学生们读给他听。“他常常会打断我们,说哪个字有问题,要与文书原件核对。有些释文他不满意,他会找文

书原件来看,然后自己修改。”

在文书整理期间,最让陈国灿感慨的,是唐先生提出每周固定一天为“文书开放日”,邀请在京学者一起来研究。“唐先生提倡学问大家做,他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多交流才可以互相启发。”而且,来的人只要有单位开具的证明,还可以抄录文书带回去研究。一时间,来了不少社科院、北大、北师大、中国历史博物馆等机构的研究者,有些学者还带了学生一起来看文书。

王素告诉记者,1975 年由国家文物局牵头的整理小组原有 3 个,仅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完成了所有工作,共拼缀较完整文书近 1800 件。《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全 10 册,1981 年出版了前 3 册,1983 年出版第 4、5 册,1985 年出版第 6 册,1986 年出版第 7 册,1987 年出版第 8 册,1990 年出版第 9 册,1991 年出版第 10 册。文书均按照原式抄写影印,有关文书情况如墨色、残缺等也一一标明,对字迹模糊、缺笔、残坏之字也尽可能推断注明。1988 年,王素主要负责编辑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全 4 卷正式立项,于 1992 至 1996 年陆续出版。王素说,他保存了 60 余封唐先生的来信,基本都是谈文书的整理和出版工作。时至今日,记者仍能在唐先生家中看到数本吐鲁番文书整理时期的笔记(如图),学术价值颇高。王素受中华书局委托,拟于近日前往整理。

(下转 8 版) ➡